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125印张 185,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50册

ISBN 7—218—00017—7/K·3

统一书号11111·223 定价1.75元

目 录

- 回忆李碧山在中国的革命活动……………温碧珍(1)
- 对兴梅人民革命斗争的回顾(上)……………王立朝(18)
- 北江特委领导清远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情况
……………何俊才(88)
- 从赣粤边转移到粤北从事革命活动的回忆片断
……………刘建华(52)
- 香港青年抗日的一面旗帜
——香港惠阳青年会……………刘 宣(58)
- 我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地下工作经历(上)……………黄清宇(74)
- 到南洋工作的回忆……………蔡毓生(119)
- 大革命失败后我在梅县的一段经历
——忆东山中学复校始末……………秦元邦(181)
- 回忆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祝菊芬(142)
- 新型的革命干部学校——东江公学……………郭 明(158)
- 粤桂湘边纵队电台情况……………卢 毅 温 健(158)
- 解放战争时期琼崖纵队电台、机要工作情况的回忆
……………冯继志(168)
- 李立三在广东……………唐纯良(170)

铮铮铁骨 宁死不屈

——广东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黄居仁

.....陈登贵 何锦洲 (194)

许包野年谱中共澄海县委党史办公室 (208)

琼崖革命根据地概况唐昆宁 (216)

琼崖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概述邢益森 钟振宏 (284)

南昌起义军到广东的经过及其主要活动

.....张兆森 谢木全 (242)

回忆李碧山在中国的革命活动

温碧珍

从越南来到汕头

李碧山原名裴公光，一九一二年六月十日生于越南南方隆安省芹德县隆和乡。他早年丧父，母亲阮氏是位勤劳刻苦、做事一丝不苟的能干妇女，对子女管教极严，生活又很省俭，她的这个性格对排行老大的碧山影响很大。

李碧山生长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越南，目睹法帝的剥削和压迫，很早就有爱国思想。在西贡读初中时才十三岁，就参加了抗法斗争活动。一九二七年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加入“东洋共产党”（现在的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在南方最早参加革命的党员之一。他曾两次被敌人逮捕和拷打，但都坚贞不屈。由于他外祖父是位乡绅，在社会上有点地位，所以先后两次均获保释，但仍被监视。那时西贡的党组织已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捕入狱，碧山也失去了组织联系。一九三二年末，经过一位从中国逃到越南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介绍，假借他弟弟的护照逃到中国广东汕头，找到了他的同乡黄近垣（当时黄在汕头办报，是大革命时的党员），黄教他学中文，

学讲客家话，把他装扮成象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在这里，他也结识了黄叔明、陈光（陈华）等人。不久黄近垣把他介绍到汕头太原牙科医务所当杂工，以便解决生活并且有个职业作掩护。

到中央苏区

一九三三年，太原医务所来了一位病人王建良（梅县松源人），经过多次谈心，了解到他与江西瑞金中央苏维埃政府有联系，碧山便向他表示：希望到苏区去学习和锻炼。一九三四年二月，松源六甲中学地下党员陈仲平布置王建良，王文湘与碧山一同到江西中央苏区。碧山很快就被安排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在党校由陈潭秋和何叔衡两同志恢复了他的党籍。学习完毕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到红军长征时，碧山被当作是南方本地干部，没有参加长征，而是奉命和另外一批人组织成一个队伍转到福建工作。当队伍出发走到一条江边时，碰到白军的袭击，队伍泗水过江，那时碧山疟疾发作，在水里昏迷过去，便掉了队。在他醒来时已被水冲到沙滩上，有一股白军追来，开枪打伤了他的左手臂，终于他被白军抓了押到兵牢里。

在监狱中

禁押碧山的那个兵牢里，关押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每天每晚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或病死。病死的，狱吏故意把尸体多留几天，以便让他们多赚死者的饭钱。牢里没有水喝、没有菜吃，每餐只有一小碗混有沙石的饭，上面放几粒盐。犯人均带着手铐脚

镣。所以只好把饭放在脚盘上，把头低下去咬来吃。大家口渴得很，没有水喝，就大声喊叫：“要喝水！”喊得多了，狱吏就泼一桶水在地上，同志们只好躺下用舌头舔水来吃。吃饭、睡觉、大小便也在牢里，一些死尸也仍放在那里。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死亡率很高，不到三个月，就只剩下几十个人了，碧山是其中幸存的一个。那时适逢国民党两广政府与中央蒋介石闹矛盾，陈济棠想尽快结束那里的事务，便叫剩下的犯人各回家乡。碧山沿途乞食，走了两个多月，才走到梅县城内，但没有熟人可找，晚上睡在一间新房子的屋檐下，因狗吠，引起屋主怀疑他是小偷，又把他捉去坐牢。官方不知他是红军，因他说潮汕有亲属，人家就把他送到潮安牢房。在这里他碰到在黄近垣家中见过面的黄唐喜，他是被怀疑贪污关进牢的。他出狱后，就把碰见碧山的事迅速告知了黄近垣，接着黄近垣和黄叔明、陈光等商量凑了钱到潮安去把他保释了出来。

组建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

碧山出狱后，再次住在黄近垣的家里（镇海学校），由于严重缺乏营养，两脚发肿，因此，不能行走。黄近垣、叔明、陈光曾背着他去治疗脚气病。在碧山身体稍为复原后，他又回到汕头太原牙科医务所去做工。那时候，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发展，碧山白天在医务所做工，晚上就换上一件长衫和一双布鞋，化装成一个小学教师的模样，到图书馆去阅览书报和接触进步青年。他们逐渐组织了“读书会”、“世界语”和“新文字研究会”等团体。随着形势的发展，他接触的青年越来越多。

一九三六年冬，李平奉驻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之

命，到汕头恢复了碧山的党籍。以后，他和李平作了分工：碧山负责恢复和发展兴梅地区党的组织工作；李平负责潮汕地区的工作。

经过与陈仲平的事先联系，碧山分别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和一九三七年三月两次到梅县松口。那时，因为有陈仲平等老党员在起领导作用，松口是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中心地区。当时有“大众读书会”、“白燕剧社”、“民众歌咏团”等三个最大的公开抗日救亡团体，后来这些团体被国民党当局解散，转入秘密活动。这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梅县松口元魁塔内正式成立了“松口抗日救国会”（秘密组织），参加的人有陈仲平、王勉、李显云、林汝舜、陈海萍、温汝尧、温碧珍、李瑟珍等十多人。这都是当时松口的积极骨干分子，以林玉明、陈仲平等人作为领导核心。早在一九三六年暑假，有个中山大学学生梁惜芳（即温流，著有《我们的堡》、《最后的吼声》等诗集，一九三七年秋在广州逝世）为领队的“旅省回乡抗日救亡工作队”回来松口，起了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个“共产主义学习小组”，有学员近二十人，经常进行学习和讨论。以上是碧山来松口前的情况。碧山来松口首先恢复了陈仲平和陈慰慈两位党员的组织关系，并通过他顺利地进行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还建立了“抗日义勇军”，这是党的外围秘密组织。

碧山第一次到我家是由林汝舜带来的。林介绍说碧山是“学抗会”的代表，第二次则是李显云陪同来的。他对我讲述中央苏区妇女同志积极参加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使我深受教育，激励了我加入党的组织，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和温汝尧一起由李显云介绍入党。随后我们成立了党小组，由李显云当组长。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下午，李显云被敌人逮捕了。六天前，国民党当局在梅城就逮捕了黄雨凝同志（即黄芸烈士）。当时松口很多人都说我是女赤色头子，因此我母亲陪着我到亲戚家里去躲避。半个月后，张惠庸（即张森）和梁隆泰两位同志来接我回家，不久，组织上决定把我调离松口到汕头党的秘密机关去工作。从此，我离开了母亲和家庭，成为以革命为职业的一员了。我母亲出身非常贫苦，只有我一个亲生女儿，父亲早逝，因此我们参加革命活动，很容易得到她的同情和支持。我参加革命后，我的家就成了开会地址、交通站，并且还在这里办过“党员训练班”。不久，我到了汕头，先住在方向明同志家里，以后转到李平家里，后又再转到组织上租的一间小房子。作为秘密机关的住地，碧山也住在这里。还有一对房东夫妇，后来参加了我们党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碧山的活动地区开始从潮汕转到梅县。最先他住到梅县城黄叔明的家里，一个多月后，黄的哥哥（商人）下逐客令，碧山不得不离开。后由黎邦负责租了上市的一间房子做了机关住址。当时党组织的名称叫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碧山任书记，其他成员有黄芸、梁练和我。不久，又调来了伍洪祥任副书记。一九三八年初，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改为梅县中心县委，先后又增加了王维、陈光、梁集祥和郭玉意等同志。

在梅县中心县委时期

一九三七年冬，碧山到福建省闽西龙岩参加闽粤赣省委党的代表大会，被任命为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长。一九三八年四月，碧山又奉命到汕头，任潮汕中心县委书记，住在陈慰慈同志入股开

的金生旅店四层楼上。不久日本飞机经常到汕头来轰炸，绝大部分市民都疏散走了，农民也不敢进城来倒屎桶，但我们的活动却比较自由，经常在主人走时留下的漂亮的房子里开会。一九三八年九月，碧山又得到方方同志的调动令，回梅县再任梅县中心县委书记，直到一九三九年六月汕头失陷。

一九三七年冬，碧山的战友梁隆泰（一九三九年任松口区委书记，现居北京，已离休）因为替碧山转一封汕头同志寄来的信，信上写了几个拉丁化新文字的字母，被国民党当局怀疑，驻松口的保安团把梁逮捕了。当时该团驻在我家里的前堂。扣押梁隆泰的房间与我的住房只距两米多远，用一块木板隔着，而那个房间又有一个小小的窗户，组织上布置李瑟珍住在我原来住的房里，为梁隆泰传递党组织的消息。在这里，梁隆泰受尽了严刑拷打，包括吊飞机、灌辣椒水等，但他坚贞不屈，后经组织及梁隆泰家属的奔走营救，才把他保释出来。梁隆泰看出我是好朋友，便经常出入我家。一九三八年八月，黄芸到兴宁与李戈仑（即李刚）联系，路经径心时突然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到兴宁监狱，在他身上搜出了写有兴宁的一些人名、地址的小本子，敌人诬蔑他是“汉奸”，对他施以酷刑。黄芸同志勇敢地严词斥责敌人，使得敌人哑口无言。这时，方方同志指令碧山到广州找八路军驻穗办事处，要求以我党的名义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无条件释放黄芸。不久黄芸就恢复了自由。黄芸是碧山非常亲密的战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比较长，而是由于黄芸的革命品质使碧山很为喜爱和钦佩。有次黄芸对碧山说：“我认为一个革命者就象一枝火柴头那样，它只擦亮一次，让人们取火使用”。碧山赞赏地说：“这是多么朴素的革命精神啊！”黄芸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在大埔牺牲，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同志们都非常悲痛。他有一

张遗像，碧山一直保留着作纪念。

由“七·七”事变前后到一九三九年六月潮汕失陷这个时期内，梅县中心县委在闽粤赣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青年学生、教师、妇女、工人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党的建设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骨干逐渐成长起来，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当时梅县国民党县政府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但实际上没有人做工作。梅县中心县委就派“留日同学会”里的我党同志，如刘清如、谢镇军、陈超寰等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我也曾参加过他们的支部会议，掌握该后援会领导权。下面设有“青抗会”、“学抗会”等，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发展了不少党员。工人组织有总工会，下面设“理发工会”、“黄包车工会”和手工业工会等。妇女组织则有妇女会。原来的妇女会是由女子师范学校的几个头头组织的旧的妇女团体，也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组织。我们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派蔡元贞、侯秀如等在里面起作用，即把他们领导权争取过来。一九三九年初，我那时化名温水，也曾在那里当过秘书。妇女会的会员，包括各阶层妇女如教师、学生、农民、女工、家庭妇女等。我们还在各区，如松口、丙村、松源、雁洋、南口、悦来等地成立了区妇女会，并先后在松口、松源、丙村开设了“妇女手工合作社”，后来也在大埔县漳溪圩设立妇女手工合作社。

在梅县国民党县政府机关的附近义化路，我党开设了一间“大众书店”。由谢双庆、梁隆泰、黄渊隆、黄光等人负责。该书店热闹得很，本地与外地要来这里订购进步书报或找寻我们组织的人都跑到这里来。碧山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也常出入于此地（不在店面）。楼上还曾举办过一期“马列主义训练班”。可以说这间书店真正发挥了当时的历史作用。但后来，由于暴露了政治面

目，被当局封禁。不久，我们又开办了另一个“启蒙书店”，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出售书报与来往方面都做得比较灰色和隐蔽。但后来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日益猖狂，还是被他们勒令停办了。梅县中心县委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做统一战线的工作。那时梅县有个“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人们称它为“第三党”）的地方组织，以陈晓凡为该会梅县负责人，在梅城、南口、西阳一带做抗日救亡工作。当时他要求与我党合作，搞抗日宣传，碧山曾派黄芸加入他们的组织，并和他们合作，在梅城、南口、西阳三处成立了剧社，我们还选举他为“梅县抗日救国会”的会长。会址设在松口，以保证我党的领导权，我们与他合作得很好，没有闹过矛盾。一九三八年底陈晓凡写了一个申请书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他的申请书说：“不管从理论上或实践上来说，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因为他是属于民主党派的骨干分子，中心县委没有权批准他参加我们的组织，于是碧山就把他的情况、履历和申请书一并向中央作了汇报。后来，中央批准了他入党。

一九三九年初，梅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熊淡荪是我们的同志廖胡今的亲戚。这个人比较进步，他明知廖是共产党员，却要他去做他的党报《民国日报》的主编。中心县委同意安排他去做了该报的主编，我们也在该报副刊上出过《妇女园地》，熊又要求通过廖同我党商讨一些合作抗日的问题，我们也通过廖个人传达过一些意见。据廖胡今同志说，这个人参加过我们的组织。

梅县中心县委除了抓建党与统战工作外，也注意抓武装工作。凡是有可以打进去的国民党武装队伍或是可以通过合法方式，组织自卫团或自卫队的地方，我们都是没有放过机会的。以李碧山为书记的梅县中心县委，于对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这党的“三大法宝”和青年妇女运动上，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

都是做得有成效的。

在闽粤赣边省委时期

一九三九年六月潮汕沦陷，兴梅危急。碧山奉命调到闽粤赣边省委担任青年部长，随即方方派他和姚铎一起到潮汕巡视和传达工作，具体任务是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重新部署力量，尽量争取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任务完成后，他们于九月安全回到机关驻地（大埔县小靖乡大宁村，高原县城茶阳十里左右，与永定接壤）。此后碧山就跟随机关转移——由大埔的大宁村转回梅县，又由梅县转回到大埔。这段时间我也由梅县中心县委机关调到闽粤赣边省委机关工作。一九三九年底在大埔期间，碧山的具体任务是协助大埔县委工作。当时黄芸担任大埔县委书记，我和碧山经常与黄芸一起工作。我们在大埔县西河区溪南埠饶彰风的岳母家建立了党的一个交通站，房东饶八英（我们称她“细姆”），自从受了党的教育，一直热情接待我们的同志，经过考验，她入了党，党需要她做什么她都尽力去做，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解放。

一九三九年底，碧山曾通过方方向中央申请调回越南工作，并已取得周恩来同志的批准，后因日军进攻，交通受阻，没有去成。一九四〇年派他到闽南地区与朱曼平、何浚等一起工作。那时闽南的环境很艰苦，每个干部都要带枪保卫，而且都是到黑夜才能出去工作，同时碧山又奉命负责在闽粤边平和县长乐乡张全福负责的老红区布置设立电台，那时我分派在电台担任政治指导员（台长是王清生）。电台建成后，碧山曾经两次到长乐检查工作。一九四一年春“南委”在大埔成立，方方调碧山回到“南委”机

关（驻地在埔南地区）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初“南委”事件发生前后，碧山组织了一批红色交通员，如温仁宝、黎广可、刘旭、蓝汉华、巫少平等。他们分别负责接送“南委”与电台之间的信件，这些交通人员，后来都成了党的骨干。

坚决贯彻中央的埋藏隐蔽方针

“南委”事件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而电台又恰巧在六天以前即六月二日（农历四月二十日午夜）发生了由于陈鹤平叛变投敌，带领平和县的保安团来向电台袭击的事件。这两个事件相隔时间这么短，虽在具体方面来说是互不关连的，但从总的形势来看，又是敌人向我们南方党发动大力进攻的统一行动。那时埔南的大埔角（即“南委”机关驻地，黄维礼同志的家）和长乐出事地点，形势都很紧张，机关必须立即进行转移和立即撤退干部。方方把这个任务交给碧山等负责，当时，特别紧急的任务是要迅速布置可靠干部护送方方转移到闽粤边境暂时住下。碧山决定把护送方方同志的任务交给王立朝同志负责。

一九四三年三月，碧山同方方见面时，方方对他口头传达说：“中央指示我们停止活动，解散组织，撤销电台，连新闻台也不要设立”。方方同志批判了姚铎的“一走了之”、“将来卷土重来”的完全取消南方革命的错误思想，吩咐碧山留下一部分骨干，坚持阵地，埋藏隐蔽，等待时机。五月，方方去延安，临行前当面指定碧山为“南委”的联络员，负责与闽西南和潮梅党的联络工作。“南委”事件发生时，埔南的高陂、白侯等地敌人气焰嚣张，捉了我们二十多个同志和群众。可是在埔北地区却还是比较

平静，就是长乐地区敌人在袭击了电台以后，虽然抓了几个保甲长和几个青年。加强了对我们的侦察工作，但也没发现他们有什么重大的行动。

碧山根据中央和方方的指示，结合自己的具体环境，作出如下几点决定：（一）迅速撤退与疏散埔南所有已暴露面目的同志到外地，对埔北地区的同志，仍能掩蔽下来的就地掩蔽，不能掩蔽的则各自到别处寻找职业隐蔽，对同志暂时不作组织联系。但其中也有个别同志保持一般联系的，这些同志如有机会互相遇见时，亦不谈组织关系；（二）把原在“南委”电台工作的同志和长乐下村的一部分党员和青年暂时集中起来，交给张全福同志负责，组成一个队伍，在离开下村出事地点较远的村庄（亦属于长乐范围）隐蔽下来。白天不作任何活动，主要躺在屋里睡觉，夜晚才活动，必要时则在夜晚转移驻地。后来，发现敌人对下村没有什么行动，我们便把下村的地方党员和青年送回原村照常生产，把妇女小孩疏散走了。电台的外地干部与本地区一部分脱产干部，就编成由程严为党支部书记、刘永生当队长的工作队，驻在粤闽边境属广东管辖的一个小地方，历时数月之久，一直待到中央来电，电台工作的同志回桂林、重庆、延安之后，这支队伍才告结束；（三）把一些可靠的骨干和自己紧密联系着，分散成立几个生产小组，有的开荒种地，有的做樟脑油，有的卖旧衣，有的仍在小学里教书。我能记忆的这些同志是：陈明、廖伟、张全福、黄长胜、胡伟、黄维礼、罗克群、郭玉意、黄大水、温仁宝、刘旭、饶德安、饶良新、黎广可、黄戈平、邹子昭、杨建昌、蓝汉华、阿先等同志。碧山本人以身作则，首先参加开荒种地小组，这个组住在礞子村（平和县长乐与大埔边境），包括碧山、王清生（电台台长，他是最后撤回中央的）、郭玉意、温仁宝、蓝汉华、

阿先和我共七人。碧山同志负责放牛，那时他的体重只有八十三市斤。可惜那年旱情严重，种下的作物都没有收成。我们仍然收听延安新华社新闻电讯，由王清生负责收听，我译电；（四）把几位主要干部派到大城市，打进国民党的机关去做事。如梁集祥、王立朝、谢文思等都先后疏散出去，以待时机，待急需使用时才叫回来（他们与组织保持书信联系）。除了一些暂时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以外，大部分都有向小组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缴纳党费。例如，教书的交米（那时教书的主要以米代薪，因纸币贬值）；没有收入的党员就按照组织每月所规定伙食标准中节省一点下来交党费；在外地工作的同志，有可能时，也曾寄点钱回来交党费。

总的说来，碧山对同志们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时，虽然不能不提到方方所说“解散组织，停止活动”的原意（据说后来中央解释说是传达错了，原意并没有叫“解散组织”），但是都强调这只是暂时的措施，而是为了保存力量、等待时机，鼓励同志们要站稳立场，坚定革命意志，要相信将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据我了解，所有疏散出去再叫回来的或暂时中断一段很长时间，但不久又恢复关系的同志（如何献群、张克昌、刘波常、刘健、陈彤、何勇为、丘碧瑾、叶云、陈永、郭玉意、陈连秀以及绝大部分疏散出去自己去找到部队或组织的同志）经过考验，均表现出了站稳革命立场，坚定革命信心，为下一阶段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大小不同的贡献。总的说来，那时期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颇大的，但党的组织只有分散，并没有解散。我们的党员就象红色的种子那样不管撒在那里，只要遇到阳光、雨露就会发芽、开花，茁壮成长！关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南委”事件后，碧山如何具体而灵活贯彻、执行中央和方方同志的指示，五十年代，碧山同志来到福建时，曾经写过一个回忆录，即《忆南委事变后闽粤边党的活动》